

上海 经济发展丛书

周振华

增长 方式 转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增长 方式 转变

周振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常 工

装帧设计 邹越非

· 上海经济发展丛书 ·

增长方式转变

周振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281 千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622-0/F·421

定价:240 元(全套)

20 元(本册)

总 序

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强有力推动下,20年来上海经济发展迈出了新步伐,进入了新天地,登上了新台阶,开创了新辉煌。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上海更是生机勃勃,气象万千,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朝着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国际性大都市的宏伟战略目标迈进。未来是从现在出发的,而现在则是历史的延伸。在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回顾上海解放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与挖掘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把握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站在时代高度展望上海经济发展前景,迎接新纪元的挑战,是极其重要和十分有意义的。《上海经济发展丛书》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背景和氛围中隆重推出的。

上海的经济的发展,一直为世人所瞩目。早在30年代,上海就已发展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之一,在国内经济生活中有着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逐步成为我国重要的大工业基地之一,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上海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经济抗波动能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产业新高地逐步崛起,整个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经济开放性格局基本形成,外向型程度不断提高,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日益加快。这一切都使得上海经济发展在国内外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引人兴奋的地方之一。

上海经济发展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在于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经济发展是一种经济生活本身所发生的非连续变化与移动,是某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其内在的推动力量就是创新。创新并不是指某项单纯的技术或工艺发明,而是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以形成一种不息运动的机制。上海经济发展的历程充分表明,体制创新、战略创新、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经济运行内在地推动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本质动因,也是上海经济发展不断走上新台阶、不断走向新辉煌的根源所在。上海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验证了江泽民总书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句名言的深刻内涵及其重大指导意义。

因此,上海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进程,非常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以进一步挖掘其丰富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理论工作者以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为指导,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对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系统完整的总结,研

究上海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功经验,对上海迈向 21 世纪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分析。

这套《上海经济发展丛书》的选题,既考虑到要全面反映上海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同时又要能够突出重点,反映上海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特色。为此,这套丛书设计的 12 个选题从各个主要方面反映了上海经济发展的概貌及特色。在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过程中,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为主体,并邀请了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协同完成了这套丛书的写作。从整套丛书来看,其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详尽的资料和数据客观描述上海经济发展各个侧面及其发展过程,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完整地揭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及前景。

2. 通过与周边地区或其他省市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上海经济发展特殊的环境条件及发展过程,突出其发展特色的分析与描述,在反映“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内容上下大功夫,花大笔墨。

3. 在总结上海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其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东西。同时,也认真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从中提炼出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东西。

4. 在分析上海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体制变革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

5. 全面分析迈向 21 世纪的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深入分析其难点, 进行前瞻性的预测, 提出相关的发展战略、基本思路或发展规划。

总之, 这套《上海经济发展丛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尝试, 也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美好开端。尽管在这套凝聚了理论工作者大量心血的丛书中有不少理论创新和新的见解, 但与现实中日新月异的经济变化变化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相比, 仍显得有些“苍白”。因此, 这一研究工作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以弥补以往的不足, 并不断跟踪新的情况, 丰富其研究内容。

这套丛书从酝酿到出版, 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高度重视, 并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袁恩桢

1999 年 6 月于上海

目 录

总序	袁恩桢
----------	-----

0 导论 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框架及上海的特殊性	(1)
0.1 增长方式转变:理论分析框架	(1)
0.2 增长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分析	(16)
0.3 上海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性分析	(27)
1 体制变革与增长转型:历史过程透视	(31)
1.1 体制变革与增长转型的约束条件	(31)
1.2 80年代上海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特点	(41)
1.3 90年代上海体制变革与增长转型进入快 车道	(48)
2 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本架构	(61)
2.1 经济主体行为方式及其关系:制度基础分析	(61)
2.2 市场体系发育程度:资源配置的组织架构	(79)
2.3 政府定位与作用:政策制订及实施	(88)
2.4 小结	(99)
3 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分析	(100)
3.1 投资推动的内在要求及其条件	(100)
3.2 投资规模增长及其特点	(113)
3.3 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增长	(124)
4 增长形态变化及新的增长格局形成	(133)

4.1	增长周期的实证分析	(133)
4.2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产业发展高度化	(145)
4.3	开放型的增长新格局	(157)
5	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背景及战略定位	(173)
5.1	世纪之交来自产业空洞化的挑战	(173)
5.2	治理产业空洞化与上海行动选择	(184)
5.3	上海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	(190)
6	全面构建上海产业新高地	(198)
6.1	产业新高地的基本模型	(198)
6.2	产业高地的基本支撑力:实证分析及判断	(201)
6.3	构建产业新高地所要解决的问题	(215)
7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国民经济信息化	(227)
7.1	国民经济信息化:上海未来的增长点	(227)
7.2	上海信息产业与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	(238)
7.3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249)
8	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重塑	(273)
8.1	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273)
8.2	大力发展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	(291)
9	迈向 21 世纪的上海经济增长前景	(311)
9.1	世纪之交的环境变化及上海自身演化趋势	(311)
9.2	上海未来经济增长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319)
9.3	上海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及其方针内涵调整	(328)
9.4	建立在社会全面进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340)
主要参考文献		(347)
后记		(351)

导 论 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框架 及上海的特殊性

在体制大变革的背景下,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调整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发展战略问题,关系到上海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命运。上海经济运行中显现的现实矛盾及问题,已使我们深切感觉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发展的增长方式已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上海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管是总结 20 年来上海经济发展历程,还是把握上海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伴随着体制变革的增长方式转变,始终是一条基本主线。

为了对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及发展轨迹有一个集成系统的描述,揭示其转变的内在动力与外部条件的整合过程及规律性的变化,在导论中我们首先给出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确定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内涵及作用机理,以便使我们能对这一重大问题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同时,我们也将从总体上指出上海转变增长方式的特殊环境条件及其特殊内容,以便我们在以后各章中更好地进行分析与归纳。

0.1 增长方式转变:理论分析框架

对于增长方式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并采用各种分析工具和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及研究的需要,我们所采用的是比较规范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增长方式的基本内涵及类

型、决定变量及其转变的衡量标准等方面构建其理论分析框架。

0.4.1 增长方式内涵及类型划分

经济增长通常是用国民生产总值 GNP 这一指标来衡量和显示的。GNP 实际值变化的时间序列构成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但 GNP 实际值是一个实际经济中的总产出水平,不仅受制于潜在总供给水平,还受到总需求变化的影响。与此不同,GNP 潜值是一个长期供给值,由潜在供给水平所决定。在现实经济中,总需求的变化可能使实际 GNP 高于或低于 GNP 潜值。

因此,当总需求不足而使 GNP 实际值低于 GNP 潜值时,便出现经济萧条。在经济萧条之后,随着总需求增加将实际经济中的总产出拉回到其潜值附近——GNP 的总需求回升到等于长期供给值,此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快于 GNP 潜值可能增长的速度。如果一个国家力求超过其速度极限,由此产生的压力会拉高通货膨胀率。

可见,总需求的变动可以解释 GNP 的短期波动,但从长期角度来看,GNP 的增长是由供给增长的速度来决定的。也就是,GNP 实际值是围绕 GNP 潜值波动的。所以当我们对经济增长下定义时,主要是指人均实际收入的长期增长。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长期的持久的增长,而不是经济周期中某一阶段的暂时性增长;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最低标准应该高于人口增长率。因此,经济增长就其本身定义来讲,实际上是指供给增长,即 GNP 潜值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国国民经济实现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基本源泉、机制与路径,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

(一) 增长源泉是构成增长方式的基础。

经济增长是诸多增长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增长方式首先涉及到增长源泉的构成,即在诸多增长因素中居主导地位的增长因素及其结构形态。如果细分的话,增长源泉有多种,但最基本、最简便的归类则是两大类:一是要素投入增长率;二是总和要素生

产率。

(二) 增长机制是增长方式的本质内容。

实现经济增长的运作机制,决定了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从而决定了要素的产出弹性及技术进步的含量。增长源泉构成的决定及其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与一定的运作机制有关。因为增长机制不仅本身就是增长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增长方式的本质体现。

(三) 增长路径是增长方式的动态结果。

在既定的增长源泉构成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运作机制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在动态过程中将表现为某种增长路径。这就是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问题。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要通过相应的增长路径表现出来的。

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没有统一的格式。例如从需求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与外向型增长方式;从供给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外延型增长方式与内含型增长方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则可以划分为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而选择哪种角度来划分增长方式的类型,完全取决于其研究的内容及其需要。从我们的研究内容及其需要来讲,主要从投入产出角度来进行增长方式的类型划分。

从投入—产出关系来讲,一定的产出水平增长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投入物(包括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增长率;二是总和要素生产率。如果我们以 GY 表示经济增长率, GK 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GL 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GA 表示总和要素生产率,那么描述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为 $GY = GA + dGK + dGL$ 。其中, d 和 B 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若将 GI 定义为要素投入增长率,那么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GY = GA + GI$ 。

利用这个数学模型,根据要素投入与总和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大小,可以把经济增长方式粗略地划分为两种类

型。如果产出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大量要素投入的积聚,或者一个社会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来维持产出水平,就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产出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要素内在质量提高及利用程度提高,或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便是典型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总和要素生产率的变量反映了资源配置、技术和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变化。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说明了技术优势的衰退,说明投入物使用效率提高不快,或兼而说明这两个问题。

当然在现实的经济增长中,投入物的增长率和总和要素生产率是不可分割的,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的。因此,从理论抽象上来讲,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方式,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在一定条件下,投入物的增长可能会带来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反之亦然。二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过渡形态,如准集约型增长方式(此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详细阐述)。

0.1.2 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是什么因素决定增长方式,从而使其具有不同的类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不同增长方式存在的客观性,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是一种主观随意性的选择,而要遵循其转变的客观规律性。我们认为,在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类型的众多因素中,经济发展阶段、体制条件、技术进步程度及对外贸易的开放度是主要的变量。

(一) 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

我们暂时撇开其他因素,仅从竞争角度来讲(即假定制度是有效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对增长方式的影响是有偏向性的。在现有的文献中,对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和方法,如按人均 GNP 水平所划分的经济发展阶段、按工业化标准划分的经济发展阶段等。为了比较直观地显示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倾向于用要素竞争(比较)优势的尺度来划分

经济发展阶段(Porter, Michael. 1990.)。

当一国经济发展尚停留在满足人们温饱水平的情况下,由于这时候的劳动力、土地、其他初级资源等生产要素是比较廉价的,所以其竞争(比较)优势在于依靠廉价的生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投入廉价的生产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成为其合理的选择。显然,在这第一个“资源推动的发展阶段”中,具有较明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倾向。

随着一国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供了规模收益(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单位的总产出率和随累积的生产时间而降低)的可能。规模收益导致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力。而规模收益的获得要靠资本(人力的和物质的)积累,以大规模的“机器”形式,或以长时间的“培训”形式出现。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收益降低了单位成本,从而使给定的家庭收入的购买力上升,这就扩大了市场规模。这可以称之为“内涵的市场规模”的扩张,以区别于按人口规模或国土规模度量的“外延的”市场规模。内涵的和外延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产生了更大规模的需求,从而引致更大规模的投资及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化。在此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大规模的投资使技术被不断物化于物质资本中。因此,大规模投资就成为第二个竞争发展阶段(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投资推动发展阶段”中,大规模投资使资本深化(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从而使人均产量也相应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讲,是与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同的。因为即使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人均占有资本额,即 $k = K/N$ (K 代表资本数量, N 代表劳动者人数)。而人均占有资本额越大,人均产量越高,即 $x = AF(k)$, 其中 x 表示人均产量 $= Y/N$; A 表示技术进步乘子。但由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是以大量资本投入为

前提的,而且因为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斜率为负(即 $x/k < 1$),故人均产量较小幅度的提高要以人均占有资本额较大幅度提高为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仍带有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色彩。当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增加资本密集性与不断开发新技术之间存着一种重要的联系。若没有新的技术加入,企业将耗尽采用通过资本更密集的技术来提高利润的可能性。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资本—劳动比率的进一步提高也将不再是可盈利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增长方式是准集约型增长方式。

随着闲暇和收入的增加,消费者的口味越来越细腻,教育水平开始大幅度提高,信息积累速度加快,人口转移已经完成和人口结构趋于老化。服务业开始增长和占主导地位。产品多样化、高质量和小批量发展。于是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日益成为产品附加值的主要部分,社会必须调整以提供创新的环境,诸如知识产权的保护、人力资本的高度积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教育的回报率的增加等因素都必须具备。在创新推动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使人均产量水平提高成为主导方式,从而是一种典型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二) 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

增长理论的深入研究向人们揭示了,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一是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加快;二是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如果说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提高,主要是因为如固定资产中的技术含量增加、资本—劳动比率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及先进技术等因素引起的话,那么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主要是因为经济体系运行效率的改善,如提高了市场的灵活性、劳动力的流动性、管理质量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以劳动生产率为例进行分析。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是一种分工协作的生产,需要进行协调。这一协调成本与参与分工的人数成正比。参与分工的人数在协调分工的成本

函数中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效率),直接与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关。而决定这种协调成本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即使在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制度变革及改善,劳动生产率水平会得以提高,即劳动生产率会按新的较高的路径变化,其增长率仍与过去相同。

由于制度变革会引起生产率路径的变化,进而影响生产率的变动,所以体制因素与增长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由于增长机制构造不同,进而其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不同,直接决定了生产率路径的高低,进而规定了其增长方式的类型。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分工协作生产进行行政性的垂直协调,其协调的效率低下,既无有效的激励,又无硬预算约束,从而带来追求速度、投资饥渴、数量扩张、效益低下等问题。因此,传统计划体制内在规定了其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即粗放型增长是传统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函数。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分工协作生产的横向协调,虽然也有某种缺陷,但其协调的效率相对较高,既提供有效的激励,又有硬预算约束,从而使人们在利益机制驱动下通过市场开拓、提高质量、技术创新、加强管理等来追求效益最大化。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是有利于促进集约型增长方式形成的。

显然,在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制度变革时期,随着制度效率的改善,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会特别明显,使其进入一条新的较高的路径。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尽管制度变革也是有成本的,但相对于其收益则是微弱的(假定这一制度变革是有效的),它可以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实现更多的人均产出。这种由于经济体系运行效率提高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其性质无疑是集约型的增长。

(三) 增长方式与技术进步。

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相联系的是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

素,而与生产率增长速度加快相联系的主要因素则是技术进步。长期增长率与协调成本的弹性成反比,与技术进步的水平成正比。因此,技术进步与增长方式之间也有着内在的关系。

由多夫曼、萨缪尔森和索洛提出的“大道定理”被证明是长期经济增长最快捷、最经济的方法。这一定理形象地说明,从A地到B地的距离甚远时,其最快的路线往往不是那种需要穿街走巷的最短路线,而是先绕到A地附近的“高速公路”上,沿着高速公路一直行驶到B地附近,再离开高速公路转向通往目的地的路线。显然,在此过程中,其增长率的高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经济均衡增长的速度。

各种研究表明,这种均衡增长的增长率是由技术矩阵水平决定的。技术矩阵水平则取决于:①每一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②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部门所占的比重。因此,技术矩阵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就是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及先进技术在更大范围的扩展。当各部门的平均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以及具有较技术水平的部门增加时,技术矩阵水平便相应提高了。可见,我们这里所讲的技术进步是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

当技术矩阵水平发生变化时,经济均衡增长的途径也将发生转移。这种大道转移意味着经济均衡增长的变速,即出现更高的增长率。在技术矩阵水平变化过程中,均衡增长途径随之转移,被称为弯曲大道问题。这一弯曲大道实际上反映了旧生产技术向新生产技术的转换,进而也反映出增长方式的转换。

因为衡量技术矩阵水平的指标通常采用中间产品投入使用效率,而考察中间产品投入使用效率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中间投入的总的耗用情况。在最终需求向量相同的前提条件下,所需投入的中间产品耗用的多寡,表明技术矩阵水平的高低。显然,在技术矩阵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其中间产品的耗用是较高的。此时的经济增长是要依靠高投入、高物耗来支撑的,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